

续写文学翻译史

——《牛津英语文学翻译史》的启示

李 钢 陈历明

(湖南文理学院, 常德 415000; 华侨大学, 泉州 362021)

提 要: 本文通过评述《牛津英语文学翻译史》来反思我国翻译文学史的写作, 认为这种写作更应该将历时的纵向描写与共时的横向展开相结合, 探讨翻译文学之所以发生、发展的文化理据, 并进一步阐述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如何参与目标语文学/文化的构建与生成, 由此提出续写中国文学翻译史。

关键词: 翻译文学 《牛津英语文学翻译史》; 重写; 多元系统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3)06-0085-5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Chinese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Oxford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English*

Li Gang Chen Li-ming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angde 415000, China;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By evaluating *The Oxford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English*,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think the history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 Chinese, and maintains that such writing should combine both a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elabor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expounds how translated literature participates in shaping or producing target literature and culture within a particular literary co-system, and hence, it argues for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Chinese.

Key words: translated literature; *The Oxford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English*; rewriting; polysystem

史家的责任往往不仅在于在浩如烟海的史籍/迹中钩沉爬梳, 甄选出代表性的材料, 告诉读者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 而且在于通过事实说话, 以历史的视角还原这些事件的前因并阐明其后果。如果没有后者, 即便材料汗牛充栋也容易流于孤立事件的历时堆积。毕竟, 任何社会文化事件的嬗变都不是在真空中发生、发展并终结的, 它们都有其独特的文化逻辑。

以文学翻译为例, 其发生、发展及其对目标语文学的影响正好印证这一过程。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译作都值得(同等的)关注, 而译作本身并不说明多大问题, 因为“翻译所造成的长远文化影响并不取决于原著或译作本身, 而是取决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会把外来知识引上什么道路”(孔惠怡 1999: 2)。20年来, 国内以“翻译文学史”命名的专著已不下5部, 应该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特别体现在第一步的材料收集和整理方面。但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 不同程度缺乏深度的阐述:

探讨翻译文学之所以发生、发展的文化理据, 并进一步阐述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如何参与目标语文学/文化的构建与生成。

埃文·佐哈尔 1978 年写成、后经修改发表在《当代诗学》的“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Even-Zohar 1990: 45-52) 以及兰伯特等发表的“法国翻译文学, 1800-1850”(Lambert et al. 1985: 149-163) 是两篇很有代表性的论文。埃文·佐哈尔认为, “不仅翻译的社会文学地位取决于它在多元系统内的位置, 翻译实践也完全由此主导。在一个抽离历史现实和社会背景的理想状态中, 我们根本连何谓译作这个基本问题都无法回答: 这一问题必须视多元系统的运作情况而定”(Even-Zohar 1990: 51)。而兰伯特考察的是“文学和翻译在特定时期的各种关系的全部系统”(Lambert et al. 1985: 149), 可见, 他们关注的翻译文学是在一个动态系统中的运作及其相互关系。

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最近 Peter France 和

Stuart Gillespie 策划并担任总主编的《牛津英语文学翻译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English*)中看出端倪。他们并没有以“翻译文学史”命名,但是,其写作却彰显出翻译文学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运作情况,有助于读者重新思考英语文学的生成与发展。

我们就从 Peter France 和 Kenneth Haynes 主编的第四卷说起,通过考察其独到的写作方法,梳理其可借鉴之处。本卷起迄时间为 1790 - 1900 年,体例安排与第三卷大同小异。总主编在总序中指出,这是一前无古人的事业(unprecedented undertaking),也是一极富挑战的工作,将首次对英语世界翻译文学这一“艺术”或“行业”的发展进行批评性的、历时性综览,揭示文学翻译是如何挑战、丰富并转变本土的文学传统。考虑到翻译史同时也是译者的历史,所以也会考察那些对此作出贡献的著名翻译家的翻译行为、从事翻译的条件以及指导其实践的规范与原则等。

英语文学史早已汗牛充栋,但英语翻译文学史从未得到全面的梳理,使得无论是文学通史还是断代的文学史都有某种难以弥补的缺陷。尽管有不少学者探讨过某些话题,如詹姆斯国王(钦定本)圣经的形成、德莱顿或庞德那种异同寻常的译作等,但一些更广泛的领域却无人涉足。

第四卷的作者根据掌握的大量材料在前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在论述所及的 110 年间,(文学)翻译作品在英语文学主流中占据中心位置(尽管其后这一风光难再),获得了某种经典的地位。通过开放英美文学,容纳世界文学,这些举措有助于推进英美文学的发展进程。

本卷共分 12 章,第一章概述英美两国的翻译史;第二章是翻译的原则与规范(principles and norms);第三章专论译者;第四章为文学翻译的出版综述。这四章构成全书的第一部分,探讨翻译的语境和环境(contexts and circumstances),对翻译材料进行初步的量化研究。

具体而言,第一章将翻译置于文学文明/教育(literary culture)、商业与政治等方面进行考察,论述当时的翻译与版权、审查制度/机构、出版社及国民教养之间的关系。其中的第一节可视为整卷的绪论,主要讨论翻译与英国文学的关系。早在 1821 年,De Quincey 就指出,英语文学需要外国文学的激励“任何国家的文学都是如此,除非通过其他不同种子的交合,这些文学都会老化”(superannuation)(De Quincey 2000: 18)。本世纪,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和欧洲文学交互发现、欣赏:不

仅德国文学与哲学首次誉满欧洲,中世纪的英国和欧洲大陆还发现了美国文学,本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俄国文学也广为人知,斯堪的纳维亚现代文学也广为阅读并翻译,此外,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希腊文学更是风靡整个欧洲。这其中,翻译所起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在欧洲,欧洲文学的翻译仅就诗歌而言,就极大地影响了如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济慈、丁尼生、史文朋等著名诗人的创作。经由翻译的这些新发现,并不局限于欧洲各国的文学,18 世纪中后期,英国就开始研究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梵语。18 世纪末其关注点已延伸至东方文学,在东印度公司、皇家亚洲协会(Royal Asiatic Society,成立于 1823)、东方翻译基金(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以及各大学的赞助下,许多译家、作家为英国译介了大量的东方文学。

众所周知,只要涉及翻译,无论是理论抑或实践,都不可避免要涉及翻译的原则/规范。一般认为,规范内在于社会,具有社会性;而原则属于个体。但是,通过考察费兹杰拉德等人的翻译实践发现,社会标准/个人原则这一两分法过于机械:各种群体、趋向与影响等多种中间范畴必须加以考虑。规范总是因时而变的:原则可以扩展为规范,规范也可以缩减为原则。个中因素要比图里所区分的“主流”、“先规范”与“新规范”更为复杂(Toury 1995: 62 - 63),因为还有一些次范畴,如“全新”、“半主流”、“早先”等;自然也超出了 Hermans 所区分的“常规”(conventions)与“法令”(decrees)(Hermans 1996: 29 - 32)以及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Tytler 1791)。

就 1790 - 1900 这一时期而言,翻译的原则与规范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翻译文体的多样性(这一点区别于前一世纪)及其互竞性(这一点区别于后一世纪)。尽管不乏创意,但更多是忠实为先,甚至逐字对译也不乏其例,散文、诗歌无一例外,古老文本的翻译更是在措辞上力求古雅。然而,这一规范并非江山一统,费兹杰拉德这种著名个案就是明证。同时,一些通俗小说的翻译也采取某些异化的文体,由于不受国际版权的约束,一些定期出版物随意盗用、删削原作。而到本世纪末期,那些自视甚高的诗人更是无所顾忌地乐于模糊翻译与模仿的边界,以此回应当代法国诗歌。

此外,作者还考察了“被译的译者”(the translator translated)这一常被忽略的现象,因为文本不一定是翻译行为中被翻译的全部,有可能译者也是被译者。换言之,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文本与译者互为主客体”,是某种近于“我注六经,六经注

我”相互阐释的辩证过程。如此考察翻译不难发现一些明显的原则,其中之一就是“跨性别”(trans-gendering):女性译者要少于男性,从文学作品的性别平衡来看,她们翻译的往往是男性作家的作品,目的就是要在男性的经典领域里证明自己,如 Augusta Webster 与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先后对《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进行跨性别创译,并以此进行跨越男性经典话语的写作实践。在翻译古希腊女诗人萨福(Sappho)时,女性译者 Katharine Bradley 与 Edith Cooper 更是跨越自身的性别,合二为一,男性笔名“Michael Field”,她们的身份在翻译中也体现出双重性、包孕性以及主客互换性。如此一来,由于缺少源头的抵抗,Bradley, Cooper, Field 与 Sappho 四位一体——Sappho 通过前三者投射其影,而其自身又反成为这三者投射之影。这表明,无论规范抑或原则,都会因时因地甚至因人而变。变是常态,当然也会有例外,总之很难一以贯之。

第三章是译者专论,关注的是男性与女性译者的翻译事业、社会地位、动机以及翻译在其人生中重要的影响,并将其归为5类:专业译者(对他们而言,翻译至少提供部分生计);业余者及热心者(视翻译为业余消遣或爱好);重要文学家(仅视翻译为创作活动的一部分);学者(他们的翻译是其学术工作的延伸与运用);女性译者(对她们而言,翻译可以体现出多种可能性)。以上这5类都可能是有偿劳动,有些业余和热心译者志在当作家,而女性译者则可能是专业译者、业余译者或作家,但很少是学者。专业译者将非英语世界,特别是欧洲大陆的作品,介绍给英语世界,他们的影响巨大。

其中的作家译者因其身份的双重性往往构成一种或隐或显的互动性,应予特别关注。如德来顿的大作中就有许多是译作,他译的古希腊罗马神话《埃涅阿斯》(Aeneas)与莆柏译的《伊利亚特》就是这期间的巨作,影响深远。对众多作家(尤其是诗人)而言,翻译是其创作的初阶/学步,他们在校期间就已经练习过翻译希腊拉丁诗歌,这种早期的古典文学训练为其日后写作提供丰富的养分,之后的创作中都不难发现其翻译的痕迹与影响(甚至将译作溶于其创作中),这包括鼎鼎大名的拜伦、丁尼生、华兹华斯,也包括乔治·艾略特、斯各特、骚塞、洛克·哈特、约翰·戴维森、道森、雪莱、罗伯特·勃朗宁、史文朋、罗塞蒂,等等。尽管限于篇幅,编者仅以柯勒律治、卡莱尔、巴蕾特·勃朗宁作为个案重点研究,但英语作家创作与翻译的紧密关系已足见一斑。

第四章是文学出版综述,旨在对整个翻译机

构进行更准确的定量描述:翻译的图书出版与期刊出版。110年积累下来的文本浩如烟海,要在短短一章中对这两方面进行完整的全景式历史还原,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因此,针对前者,作者以两部权威的标题目录为本:一为《十九世纪短标题目录》,时间跨度为1801-1919年,缺失的1790-1800年可由后一本补足;后一本为《英语短标题目录》。前者是根据英国、爱尔兰和美国的八大图书馆藏统计的,而更为详尽的后者是根据全世界1600个研究机构的收藏整理的。为求概貌,作者分别抽样截取1830和1890年,分原语(如拉丁语、法语、德语等)和文类(如小说、戏剧、诗歌等)两个表格进行百分比对照,比较客观地反映出各自的翻译走势,让人一目了然。期刊的译文统计也以采样方式进行,分3个10年段落(1830-39, 1850-59, 1870-1879)分别对 *Blackwood's* 和 *Fraser's* 两份著名代表期刊就原语进行数量对比分析。

第五章谈希腊、拉丁文学;第六章论中世纪和现代欧洲文学;第七章为东方文学。此三章可归为语种文学或地域文学,分别涵盖从希腊拉丁语、欧洲现代语种以及东方语种的文学翻译。当然,由于这个时期的翻译文学浩如烟海,只能有所取舍,结合材料的纵览与某些具体个案的新探讨,以取得一定的平衡。而在具体的操作中,因材料的数量(法语文学的翻译就远大于拉丁文学)、文学价值以及撰稿者的个人嗜好等因素,这种平衡难免有所倾斜。在讨论新近引介的英译本中(如俄语、汉语等),首译者的开创性工作往往得到特别的关注。

第八章为大众文学;第九章是音乐文本与口头文学;第十章是圣书和宗教文本;第十一章论述哲学、历史和旅行作品。这四章按文类划分,依次展开论述。

第十二章主要是译者的小传,旨在通过为正文中提到的译者提供了解其基本信息的一席之地,以补充先前章节的讨论,同时提醒我们关注这些具有内在研究价值与历史影响力的个体译者。

纵观此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与第三卷比较,此卷内容更为丰赡,数据更为全面,撰稿人数也更多,各章节分别由世界各地(主要是英美)37位相关(跨学科)领域的专家执笔。因为个人的精力、研究范围毕竟有限,要就各个时段的各个方面都拿出最令人信服的成果,仅凭一己之力,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著,一二人的确勉为其难。

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共时、历时相结合——这一点与第三卷的编写思路是一致的。编者同样没有按部就班以时间为经,仅就翻译论翻译,而是围绕着翻译的方方面面来立体展开:既有历时的纵向发展描述,也有共时的横向展开探讨。因为翻译不可能在真空中单向行进,它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审美诉求,是翻译主体、客体、类型、规范、过程、市场及其影响等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既有现象学的表征,也不乏发生学的溯源与影响因子评价(陈历明 2009: 393)。作者无疑充分注意到这些,因而除了专章进行共时的横向阐述外,即便是在第一章的历时综述中,也有专节论述读者和出版商以及有关政治和法规。

这种纵横结合、时空交错的展开使其描述立体化,既有定性抽绎,也不乏定量分析,从而更有助于读者从多方位了解并把握翻译的内外运作机制,这种研究方法在国内现有的(文学)翻译史写作中尚属难得一见。以国外比较成熟的方法理论这一他山之石,攻己之玉,自然别有一番风景。

厘清世界文学与本土文学的关系,这两者在此其实就表征为“翻译”对/与“创作”影响/互动,因为世界文学基本上都是以翻译为中介进入并影响本土文学(的创作)的,这一点得到“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首倡者歌德(Goethe & Carlyle 1887: 42)的认可。作者把翻译对本土文学创作的影响予以大胆确认,并对此进行有效的梳理,正本清源,为英语文学史的重写提供不可或缺的佐证。

就许多作家而言,创作中寓翻译,翻译中寓创作,论其创作倘不溯其翻译,揭其创作之论则往往难有所本。古今中外就有不少作家/作品模糊了翻译与创作的边界,因而引发各种争议。权威的《诺顿美国文学》,其中梭罗《瓦尔登湖》中的“经济”(Economy)一文有较明显借用我国《孟子》之处,作者概述中并不见其创作与翻译之渊源。但本史撰写者眼光毒辣,言之凿凿地指出,梭罗通过翻译,或模仿,或再创作,甚或剽窃了《孟子》:

I long ago lost a hound, a bay horse, and a turtle dove, and am still on their trail. Many are the travellers I have spoken concerning them, describing their tracks and what calls they answered to. I have met one or two who had heard the hound, and the tramp of the horse, and even seen the dove disappear behind a cloud, and they seemed as anxious to recover them as if they had lost them themselves (Thoreau 1980: 17).

Mencius says "If one loses a fowl or a dog, he

knows well to seek them again; if one loses the sentiments of the heart, he does not know to seek them again. . . The duties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consist only in seeking after those sentiments of the heart which we have lost; that's all".

经笔者核实,此语出自《孟子·告子上》:“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译:有人家中的鸡狗丢失了,还知道去寻找,然而丢失了本心却不知去找寻。学问之道并无他法,只是将丢失的本心找回来罢了。)

不难看出,翻译对另一种语言文学的创作意义深远。著名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庞德认为,英国文学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外来注入才得以在过去一个世纪保持着活力(Pound 1965: 34-36);史文册读到了希腊文学,由此掌握英语的格律;罗塞蒂引进了意大利的纯朴风格;费兹杰拉德创制了广为人知的一首好诗(*Rubáiyát of Khayám*)。他坦承,英语诗歌“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称之为英语诗歌”,因为自乔叟后,“英国文学总是以翻译为生,靠翻译滋养;每一次新的繁茂、新的起伏都因翻译而起;每一个值得称道的大时代就是翻译的时代”。

这种建立在大量事实、数据基础上的论证表明,英语文学的成长深受翻译文学的影响,正如作者所言,“如果夸大伟大译作会歪曲文学史的话,那么,低估它们同样会发生这种歪曲”。回避翻译文学的影响,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就会存在较大的缺陷。国内外学者、作家对此大都表示认同。就我国古代文学而言,佛经的翻译“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命题遣词方法,也就是带来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重大变化”(方立天 1988: 319)。如果没有佛经的翻译,我国的古代文学/文化史无疑必须改写。现代文学也不例外,“我们几乎可以武断地说,没有文学翻译,五四的新文学就不可能发生,至少不会像那样发展下来”(余光中 2002: 36)。可见,回避翻译影响研究会阻碍我们更加理性地思考中国文学的生成。

就我国已有的翻译文学史来看,“翻译文学史的内容似乎只是翻译家的活动及其译作的归纳和描述”(谢天振 1994: 272),“很少涉及翻译活动如何在主体文化里面运作的问题……绝少触及翻译活动所能产生的庞大文化力量以及翻译活动和主体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孔惠怡 1999: 3),这一状况在我国翻译文学史或文学翻译史的写作中并没有明显改观。这种仅以年代为序的纵向单线写作,对我们了解具体翻译家及其翻译活动来

说自有其无可厚非的价值,但如果想要为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学系统中进行定位,这就远远不够了。因为翻译文学史“实际上已经不是单纯的翻译文学史,它还是一部文学关系史。这样做的结果显然使翻译文学史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全面,当然,同时也使翻译文学史的编写变得更加艰巨、更加复杂”(谢天振 1994: 275),这是一个无法也不可能回避的巨大挑战。

如果翻译文学史只有译者的产品描写和材料的罗列与归类,就容易流于平面化的历时描述,使人误以为文学翻译只是为了不懂外文的本土读者阅读外国文学的权宜之策,是与本土文学事业无关的孤立事件,从而很难让人洞悉翻译事件(发生)/文本(产生)背后的各种角力或推力以及接收文学系统或中心或边缘的动态关系,难以使文学学者或史家相信,翻译文学以各种方式参与本土文学的生成与发展。结果,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学者有理由相信翻译文学史是本土文学的一部分,可是缺乏扎实的论证;而本土文学学者由于看不到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只好认为那是外国文学,以致聚讼纷纭,争持不下,这也是造成翻译文学不东不西的主要原因。

写好翻译文学史是一国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此,我们可以(也实在有必要)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一二人主事,集结各路才俊,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参照《牛津英语文学翻译史》的写作经验,历时的纵向描写与共时的横向展开相结合,微观的语文学对比与宏观的文化研究相结合,群策群力,这样,才能形成立体化的写作模式。由此看来,续写中国文学翻译史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陈历明. 翻译与英语文学经典的形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究, 2009(5).

方立天.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孔惠怡. 翻译·文学·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谢天振.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M]. 台北: 业强出版社, 1994.

余光中. 余光中谈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

De Quincey, T. *Works*. III [M]. London: Grevel Lindop, 2000.

Even-Zohar, I.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J]. *Poetics Today*, 1990(11).

France, P. & K. Haynes. *The Oxford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English*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Goethe, J. W. & C. Thoma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Goethe and Carlyle* [M]. London: Macmillan, 1887.

Hermans, T. Norm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nslati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 In R. Álvarez & M. Carman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

Lambert, J. et al.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 France, 1800 - 1850 [A]. In T. Hermans (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C]. London & Sidney: Croom Helm, 1985.

Pound, E.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5.

Thoreau, H. D. *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1995.

Tytler, A. F. *Essays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Kent, 1791.

收稿日期: 2012-05-03

【责任编辑 王松鹤】